



历史学的实践丛书

史学方法论

杜维运 著



HISTORICAL METHODOLOGY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历史学的实践丛书

史学方法论

HISTORICAL METHODOLOGY



杜维运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学方法论/杜维运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6.5
(历史学实践丛书)
ISBN 7-301-10662-9

I. 史… II. 杜… III. 史学-方法论 IV. K0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2061 号

书 名: 史学方法论

著作责任者: 杜维运 著

责任编辑: 刘 方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10662-9/K·0446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mm × 980mm 16 开本 25. 印张 350 千字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 - 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增写版自序

从 19 世纪初叶,迄于 20 世纪即将结束的今日,西方史学的发展,像是狂飙骤起,瞬息万变,其间学派的林立,理论的丛出,历史著述的竞新争奇,论辩声音的此落彼起,令人如置身惊涛骇浪之中。晕眩之余,为之茫然!史学的黄金时代(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),继之以历史虚无论(historical nihilism)的猖獗,史学出现危机(crisis in historiography),历史濒临死亡(the death of history),凡醉心史学,酷爱历史者,岂能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?以有历史与史学而文明的人类,将唾弃史学,摧毁历史,人类前途,将归何处?

19 世纪初西方出现的史学运动(historical movement),促使西方史学进入黄金时代。德国大史学家尼布尔(Barthold George Niebuhr, 1776—1831)与兰克(Leopold von Ranke, 1795—1886)是运动的代表人物,他们开创了一种语言文字的批评方法,从语言文字方面着手,追寻史料形成的来源,批评史料可信的程度,这是极富科学精神的史学方法。从此西方史学解脱了神学羁绊,而进到科学领域里面去。整个 19 世纪,严肃的历史学术(historical scholarship)形成,科学的治史方法成为时尚。史学家自信能搜集到所有的史料,自信能解决历史上所有的问题。其乐观的态度,风发的意气,百年以后,犹可想见。

随着科学治史方法的流行,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,乘



时而起。赞成历史是科学的史学家,认为“历史是科学,不少也不多”。持相反意见的史学家,则认为“历史是艺术,一种只能靠想象才能成功的艺术”。如此纷争,延续了百年以上。大约到1930年代以后,西方史学家对于争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,已感到不耐与疲倦。连哲学家罗素(Bertrand Russell, 1872—1970)也说:“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,有很多争论,在我心目中,多少是无谓的。我想,它兼具二者,应为昭然若揭之事。”厌倦了讨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,足证这个问题的讨论,是如何的成为风气,而且厌倦的理由,是基于一个不必争论的结论:历史是科学也是艺术。科学对历史的征服,至此应算是已经成功了!

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趋于式微之际,新历史与旧历史之争又起。旧历史从上层写,写贵族及精英分子的事业与成就,是精英史(elitist history)。新历史从下层写,写被忽视的谦虚的大众,是大众史(populist history)。旧历史采用兰克以后流行使用的方法,新历史采用量化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。旧历史呈现出来的是和谐的叙事,深具意义的整体。新历史呈现出来的是一篇接一篇的专题研究,没有叙事,尽是分析。两者比较起来,有如两极,相去绝远。

在新历史与旧历史争论方殷之时,后现代主义(postmodernism)异军突起,袭击历史。所谓后现代主义,系对现代主义(modernism)的反动,不满现状,不服权威,勇于创新,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叛逆的思想之一。其初起约在1960年代末期,其涉及的范围,为建筑、艺术、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政治、社会、法律等广大领域,其企图直欲一举尽毁西方学术文化之传统而后已。其影响于史学尤为严重,史学家忧心后现代主义最低限度将摧毁历史,甚至于整个历史事业(historical enterprise)将为之荡然以尽。如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(truth),没有客观(objectivity),没有真实(reality),历史是推论(discourse),意识形态的化身,史学家的语言游戏(language game),与文学作品的虚构,没有两样,这是极为惊人的议论;从文献中,后现代主义者也不认为有“故事”(story)能叙述出来,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(continuity)、和谐(coherence)、一致(consistency);史学家所盛



倡的移情(empathy)、想象(imagination),设身处地的进入历史之中,后现代主义者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;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在及未来没有任何作用。持论如此,于是有人宣布历史已经死亡了(the death of history),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释了(the vanishing of history),有人高呼历史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(the end of history)。这真是极为彻底的历史虚无论了!

西方近两个世纪史学的发展,从上面的大略叙述,可以看出其瞬息万变的情况,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史学方法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。史学运动所建立的新史学,与科学的史学方法是连在一起的;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,所争者主要在史学家研究历史究竟要用科学方法还是艺术方法;新历史与旧历史之争,毋宁说是新史学方法与旧史学方法之争;后现代主义的荒谬之论、过激之说,则由于后现代主义者不知史学方法。不知自文献错综复杂以重建过去的史学方法,自然要宣布历史死亡了;不知史学家精确的叙事与解释的史学方法,自然认为历史与虚构的文学作品无异了;不知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的史学方法,自然认为史学家无法进入历史之中了。史学方法,看似雕虫之艺,而关系史学命脉如此!

距今二十年前,我写了《史学方法论》一书,当时是在沉醉于西方史学方法的情况下写成的,同时怀着融合中西史学的希望,时时以中国史学方法与西方史学方法相印证,相发明。唯以学之不博,识之未精,不理想处,自知颇多。书出以后,搜购与阅读西方论史学方法之书,兴趣未减,并倾力撰写《中国史学史》一书,以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史学方法。1993年《中国史学史》第一册问世,去年春天,第二册梓行。第三册在策划之际,为《史学方法论》动大手术的念头忽起。不等待《中国史学史》写完而动笔修改,与后现代主义猖狂有关,也出于表彰中国史学方法的一念。后现代主义大放厥词,不少史学家主张不予理论,但是数十年风靡全球的学说,岂能置若罔闻?其有所蔽,也必有所见。历史科学主义(historical scientism)的万丈气焰,招来历史相对论(historical relativism)及后现代主义的反扑,是必然的。学术以愈辨而愈明。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,已使科学



方法与艺术方法在历史研究上变成朋友一样的方法(friendly methods),相容而并存。后现代主义骇人听闻之说,当成诤言,借作警惕,也必其利无穷。此次为《史学方法论》动大手术,增加的《一部柔美的历史》、《可以看到听到的历史》、《史学家的胸襟》、《史学方法的承旧与创新》四章,除介绍西方新出的史学方法外,主要是将后现代主义透明,以见其韬蔽所在及其可取之处。“天下之理无穷”(顾炎武《初刻日知录自序》),凡治史者,应服膺顾亭林之言。

中国史学自19世纪迄于当代,落于西方史学之后,18世纪以前,则驾西方史学而上之。凡记注制度的完善,史料征存的丰富,优良史籍的前后相望,相关学术的簇拥史裁,西方皆望尘莫及。即以史学方法一项而论,其新颖多变,不如西方,而切实可行,则逾西方。“聚群籍而考其异同,辨其是非”的方法,出产了多少不朽的史学作品?先作丛目,再作长编,最后写成《通鉴》,司马温公所创的写史方法,其理想岂有伦比?细致叙事,审慎解释,精确考证,中国史学家所遵行的史学方法,皆深值称道。以致数千年来,中国史学绵延发展,从未出现史学危机,也不见历史无用之论,更无推倒历史之说,这是极令人欣喜的。所以在西方史学出现危机,历史濒于沦亡的今日,以中国史学方法与西方史学方法相印证,相发明,以融合中西史学,应是史学上的大业。此次以较大幅度修改的《史料析论》、《史料考证》、《历史辅助科学》(易名为《博学与历史研究》)、《历史的功用与弊害》(易名为《历史的两个境界》)、《比较方法》诸章,皆尽量多增加中国的史学方法。其他各章的修改,则多在文字方面,凡引文过长,措辞欠妥,语气偏激之处,皆斟酌删节润饰。《绪论》及《历史文章的特性及其撰写》(易名为《历史文章的特性与风格》)两章,内容上也有增加。有待大修的《分析方法》一章,以分析历史哲学(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iory)不精,就只有听其自然了。

二十年来,此书维持畅销,读者的爱护,使我深深感动,也增加了我修改此书的念头。读者群中,以大学生为主,有时在一些场合中相遇,当他们知道我是作者时,往往不约而同地说:“杜教授,你怎么还那么年轻?”从



来不显年轻而老是与“老”相连的我,听到此语,如饮甘泉,陶醉之情,笔难尽宣!英国光棍史学家吉本(Edward Gibbon, 1737—1794)在写完其大著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(*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*)以后,最欢欣鼓舞的事,为美丽而年轻的女读者写信给他。青灯黄卷,长期辛劳,得到短暂的欣慰,也应当是学术上的丰收了!

海峡两岸的书评及朋友们的来信指正,是最使我难以忘怀的。前辈学者严耕望先生来信(1980年1月27日)指出的错误,已遵示改正(见第五章注⑩)。至于他称许拙著“贯穿中西,熔冶一炉”,则不敢当。徐复观先生来信(1979年7月1日)论思想与方法的关系云:“方法由思想而灵,由思想而活而透。思想则由方法而实,由方法而得其轨辙,有所制约。”这是极为精辟之论,此次修改《绪论》一章,参酌其论而未尽其意。早年以写《史学与史学方法》一书而驰名的许冠三教授则来信(1979年10月8日)云:“读大著《史学方法论》后所念之难释者,并非社会科学入史、分析哲学解史之类美国学人之热门话题,而系困扰史学数千年之求真与为善如何兼得之难题。揣先生之意,似亦主鱼与熊掌应兼而得之者。然先生之文,似乎时而重求真,时而崇为善。或者说于史料考证上求真,于史著撰述上为善,而其间有无冲突以及其他有关之问题,似乎大著甚少涉及。”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。多年以来,时常思考及此,而困惑不已。史学之业,求真为金科玉律,不容变易。然史学家于史著撰述之际,以淑世之怀,为善之笔,善选素材,写成良史,以维文明,以正世道(详见《一部柔美的历史》一章),鱼与熊掌,兼而得之,岂非双美?愿冠三教授有以教之。

老朋友杜聿新兄倾七日之力,详读此书,并纠正误谬(如错字、跳行、跳页之类)五十七处;李弘祺教授则指出英文上的错误十九处;旅美学人黄培教授来信诋正者,不止一次;我最敬爱的李玉灿大哥则只有称美,全无批评。有朋友如此,真感幸运无穷。师友之间的邢义田、胡昌智、黄进兴诸教授(与弘祺教授也是师友之间的关系),时常来信,殷殷感人。他们于美言以外,屡进诤言。昌智教授洋洋数千言的来信(1979年12月3日),所论述者,皆严肃而有深度,他提出“方法是制度化了的讨论过程”之



说,认为“在方法上的理性化是必要的;方法上的理性化是制度化的同义词,是把抽象原则具体化的过程”。这是讨论史学方法的极高目标,愿与同道共勉之。(二十年来,朋友们的来信很多,难以一一列举,惟永远是感激的。)

海峡两岸的书评,据我所知者,约有张存武教授的《杜著〈史学方法论〉读后》(《史学集刊》第十一期,1979年5月),黄俊杰教授的《杜著〈史学方法论〉评介》(《出版与研究》),范达人教授的《比较史学新兴,促其放异彩——杜维运教授比较史学观介绍》(《史学理论》,1988年第1期),罗仲辉教授的《杜维运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》(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,1996年第2期),以及1997年刘凤学女史在中华电视公司“书香满宝岛”节目上的推荐。(其他见于专书者不赘及)这些评论,达人、仲辉两教授兼评拙著《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》、《中西古代史学比较》两书,词多溢美,惭感交集。存武教授是我大学同班好友,也是同教史学方法论的教师,他的评论,称美处是鼓励,指正处是真正缺点所在。俊杰教授是论学好友,他也是教史学方法论的教师。他们两位的评论,一致认为介绍社会科学的方法不够,这是切中要害的评论。此次修改《历史辅助科学》一章,尽力而为,仍不理想。凤学女史以古典舞蹈艺术大家,推荐此书,甚感意外,她强调说:“作者提出史学家必备的条件,慈悲的胸怀,冒险的精神,客观的态度,以至于可分析的精神,我想这不仅是治史跟史学方法的良药,也是人性中间至高至善的特质、美德。”以此书当成“励志文摘”,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。如果此书真有此功能,那将是我喜欢欣鼓舞的事了。

1999年5月序于台北市看山楼

修订版自序

宇宙间人类的出现,不知历经若干世纪,属于莽莽榛榛的草昧时期,可能在数十万年以上。自文字发明以后,而人类进入文明时期,历史的记载,亦在文字发明的同时或其后出现。人类有历史记载了,才进入历史时期。人类的历史时期,长不过五千年,其初期的记载,极为浮泛粗略,且多湮没,其存留至今,可当正式史书之名者,从中国的《尚书》,到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(Herodotus, c.484—c. 425 B.C.)所写的《历史》(*History of The Persian Wars*),都是近两千余年以来的作品。因此人类有正式史书的时期,不过两千余年。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,两千余年不算漫长,然而在中国、西方以及世界所有地区,大量问世的史书,却形成历史学术的渊海。年轻、黑发、朝气蓬勃的人,一旦进入此一渊海之中,毕生纵游,而不能窥其涯涘。历史的博大,冠于群学,自此可见梗概。

在近百年以前的史书渊海中,专门谈史学方法的书,寥如晨星,是一种很奇异的现象。8世纪时,中国出版了万卷以上的史书(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史书即在万卷以上)以后,第一部专门谈史学方法的《史通》一书,才姗姗问世,《史通》于是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专门谈史学方法的书。《史通》问世后一千年,中国第二部专门谈史学方法的《文史通义》一书,才再出现,章学诚也因此书而获得了集中国史学大成的令誉。大约在民国以前,中国史学家谈史学方法而



萃为专书者,就仅此两部了(专文或专书中某一部分谈及史学方法者,自然甚多,此类资料,有待汇聚)。西方在 1889 年才由有“西方史学方法之父”之称的伯恩海姆(Ernst Bernheim, 1854—1937)写出了第一部《史学方法论》(*Lehrbuch der historische Methode*)。十年以后,亦即 1898 年,法国两位史学家朗格诺瓦(Charles V. Langlois, 1863—1929)与瑟诺博司(Charles Seignobos, 1854—1942)合写了一本《史学原论》(*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*),史学方法自此在西方才正式竖起了旗帜。西方史书以形形色色著称于世,而专门谈史学方法的书,迟迟出现如此。进入 20 世纪以后,中西(尤其是德国、英国、法国、美国)谈史学方法的书,丛出并作,蔚为空前未有的奇观。以英文方面的作品而言,为数即在数百种以上(浮泛粗糙之作,自然占大多数),这与以前两千年比较起来,像是出现了奇迹。什么原因促使这种奇迹出现呢?

在历史的洪流中,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,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、史书大量盈积之后,才能出现。刘知几写《史通》,章学诚写《文史通义》,其基础是奠立在一两千年发展下来的史学之上的。没有司马迁、班固的史学,没有魏晋南北朝蓬勃的史学,刘知几怎么能够写成其颇有系统的史学方法呢?没有刘向、歆父子之学,没有郑樵通史之学,章学诚的辨章学术的方法,撰写通史的方法,怎么能够形成呢?继希腊、罗马史学,文艺复兴史学之后,极为进步的 19 世纪史学出现了,于是伯恩海姆、朗格诺瓦、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形成了。因此史学方法这门学问,到 20 世纪而蓬蓬勃勃,是一种必然的趋势。这也说明了这是一门真实的学问,背后有其深厚的史学基础,而不像空中楼阁一样,建立在烟云之上。如何乘势使这门学问发扬光大,应是当今的急务。这就有待建树一套史学方法的方法论了。这方面,几乎完全未被中外史学家所谈及,窃意其重要性极大,愿掬管见一言。

置身 20 世纪的今天,想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,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,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,将中西史学家治史的方法,融会在一起,取其长而去其短,择其精而遗其粕。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的



史学方法,是尽善尽美的,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史学方法,是可以代表史学方法的全部的。认为中国的史学方法,无懈可击,是一种迷信;认为西方的史学方法,独步寰宇,是盲目的崇拜。章学诚、伯恩海姆也只能提出一部分的史学方法。往往一位极为出色的史学家,利用毕生的经验,创获一项史学方法,另外一位史学家,利用另外的经验,创获另外一项史学方法。其创获虽少,而皆有其可行性。积中外无数史学家的治史经验,而史学方法乃大,而史学方法乃不流于游谈无根。因此完全师心自用,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史学方法出来。撰写史学方法的史学家,要采用综合的方法,综合中外史学家的治史方法,以凝为一体。如凝结得完美无缺,便是一种新创了。

史学方法应使其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问,从事之者,如能终身殚力于此,则此学的昌大,可指日而待。或谓方法系空谈,写出史书来才算数。但是史书怎样才能写出来呢?有人又谓太史公写《史记》,司马温公写《资治通鉴》,都有其方法,方法在工作之中,工作久了,方法自然悟出来了。但是这又是多么迂远的路呢?希望太史公、司马温公各写出一部史学方法出来,是一种苛求。他们都以毕生的精力,写一部历史大著,及其大著完成,而华年已逝,精力已衰,“筋骸痠疼,目视昏近,齿牙无几,神识衰耗”(见司马光《进资治通鉴表》),在此情况下,他们怎能再鼓其余勇呢?即使再有精力,他们可能受其所写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的方法的限制,而不能将史学方法的范围扩大,这就是极为遗憾的事了!因此需要有人以毕生的时间,专门从事于此。自然他决不能是一个丝毫没有做过历史研究(historical research)的人,丝毫没有做过历史研究,就不能写史学方法,勉强写出来,决不适用。史学方法学家,可以采用治学双轨制,一方面做实际的历史研究,一方面做史学方法的研究,有实际的经验,同时长时期思索史学方法的问题,这样史学方法便不是片面的经验或顷刻而成之学了。一人写其治史经验,是必要的,而不足以尽史学方法之大;为气愤而写史学方法(刘知几以不克修史,愤而写《史通》,章学诚以向乾嘉起反动而写《文史通义》),史学方法将失去雍容尔雅的气象;为写教本而写史学方法,



为趋风气而写史学方法,而且成于顷刻之间,史学方法便变得浮泛而无深意了!所以将史学方法变成一门完全独立的学问,有专人终身从事,是昌大史学方法的最好方法。

用尽热诚,将史学方法当成身心性命之学去从事,是史学方法的另外一种方法。将史学方法看成机械的,冷冰冰的东西,永远没有办法写好史学方法。史学方法与历史一样,是一门有生命的学问,充满了活力与神奇。从事之者,要有炽如烈火的生命力,要付出所有的热诚。不然,所写成者,将类似数学上的方程式,英文上的文法书,刻板乏味,神采毫无,于是史学方法在一般人心目中就沦为纯粹技术之学了!这就令人无限唏嘘感慨了!刘知几、章学诚为气愤而写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,因为气愤中有热诚,以致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义》两书的意味深长,神采飞扬。史学方法学家如能倾纯正的学术热诚于史学方法之中,则“方以智”的方法论,未尝不可以变成“圆而神”的思想史。方法一旦与思想相通,方法乃真乃大。

拙著《史学方法论》自1979年2月出版以来,到现在已整整六年了。六年中,识与不识的读者,寄来接近60封的来函,是我最大的收获。他们的批评与建议,扩大了我的眼界;他们的谬许与鼓舞,增强了我的信心。将来拙著动大手术的时候,必一一斟酌采纳这些珍贵的意见(二、三、四、五版作订正时,仅采纳涉及字句之小者)。数年前与今年自香港返台讲学,讲授此课,学生们的热烈反应,无异在我的学术生命中,注入了兴奋剂。偶尔应各大学之邀,作学术公开演讲,讲题多被指定为史学方法的范围,我像是当上史学方法的护法了!公开演讲时,学生们(恕我妄自尊大,听讲者有老师们,但他们都谦逊而不发言)有时发言踊跃,几十个问题提出来,而且态度诚恳祥和,眼见新一代呈现出优美的气度,欣喜之情,真非楮墨所能尽宣。

在拙著问世踏入第七年而印行第七版的此时,我想谈谈我写这部书的方法。

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,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,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,是上面已经讲过的。不过,我万万不敢说已有了世界史学的基



础,也不敢说已兼通了中西史学,我只是朝着这方面努力,并用尽热诚去终身从事这门学问。犹忆 1962 年至 1964 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之际,本来可以不用太费力气地拿到一个学位,可是偏重理想主义的我,当时感觉与其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兜圈子,何如在西方史学的大原野里驰骋?于是搜读西方讨论史学方法的书,变成当时的最大兴趣。离乡万里的孤寂,都给冲淡了。1974 年至 1975 年再去剑桥大学,搜读这方面的书,到达如痴如狂的地步。伦敦、牛津、剑桥三地的新旧书店逛遍,买到一本,即觉精神一振。买不到的就借读,并作札记。如不外出,自订上午、下午、晚上三个时间阅读(各限三小时),数日即读一本,数月下来,大有可观。可是有一天晚上,突然感觉怎么也读不下去了,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,家信也不能写,心想什么都完了。急着去看英国医生,医生量我血压,说好极,也查不出病来,开了些镇静剂一类的药让我吃。以后有两个礼拜一点也不看,只看剑河里的水。情况较好后,上午看书,下午以后休息。后来增加到上、下午看书,晚上休息。一年下来,几十本书读完,奠定了我在西方史学方法上的基础。撰写的过程,也是很艰苦的。在台大教书期间,大约一年只能写一章。到香港大学以后,由于应酬甚少,精神无聊,不得已晨夕挥毫,于是一年可写六七章,二十二章的此书,乃得以顺利问世。此书问世后,在精神上是舒畅的,而小病亦至。大凡历史工作者在完成其自视为主要的著述时,或大或小会生一场病,这是劫数,不必畏却。挥毫之余,与好友飞羽觞,饮甘泉,什么大病小病都无影无踪了。

顾亭林于《初刻日知录自序》云:“炎武所著《日知录》,因友人多欲抄写,患不能给,遂于上章阙茂之岁,刻此八卷。历今六七年,老而益进,始悔向日学之不博,见之不卓,其中疏漏,往往而有。而其书已行于世,不可掩。渐次增改,得二十余卷,欲更刻之,而犹未敢自以为定,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。盖天下之理无穷,而君子之志于道也,不成章不达。故昔日之得,不足以为矜,后日之成,不容以自限。”生平最服膺亭林这种不断修改《日知录》的态度。我写这部《史学方法论》,也想效法前贤,不断修改。以前出的几版,校正误谬近两百处。这一版,校正误谬以外,增加了《传记的



特质和撰写方法》一章。这一章的写成,是有一段悠长历程的。记得在研究所的时代,写过《传记学》一文,登在某杂志上(名称都忘记了),很不理想。教史学方法论一课时,新写了《传记学与史学》一篇讲稿,约三四千言,讲来讲去,也觉问题重重。直到实际写过《赵翼传》以后,才勉力新写《传记的特质和撰写方法》一文,作为这部书的一章。现在我正着手《中国史学史》的撰写,大约耗十年的时光,十年后再为这部书动大手术,以报答读者。“昔日之得,不足以为矜,后日之成,不容以自限”,愿以亭林之言自励,并望海内外博雅君子,不吝赐教。

1985年2月序于台北市观山楼

初版自序

治史近三十年,最醉心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的研究,如饮甘泉,如嗜醇酒。或笑其痴迷,或劝之更张,而置若罔闻。昔龙门、涑水,倾毕生精力,从事著史,往事缕缕,得垂千古,史学之大,莫过于此。今不著史而论著史之法,疲精劳神于古人翰墨之间,覆瓿之讥,自知难免。然而学问以专门而愈精,真理以深辩而丛出,沉淫于史学史与史学方法之中,上阐古人精微,下启后人津逮,其于史学,或有裨补,当能为天下所共认。

1962年至1964年负笈英国剑桥大学,是我治史生涯中最富关键性的阶段。在此以前十年,凡所阅读或论述,几尽在中国范围以内;赴英以后,扩充范围,遇有西方史家论及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的专书或专文,或搜购,或传抄,寅夜诵读,孜孜矻矻,不啻饥渴之于甘美。剑桥宁静,景色宜人,苍老的寺院,柔美的康河,衬以绿茵,杂以古木,读书其间,感受特深,于是抛尽尘世所追逐的虚浮,而完全到忘我的境界。史学的美富与自然的秀丽,此时已相融合,难以划分。返台以后,姚从吾师约我于台大历史系共讲“史学方法论”一课,翌年复应辅仁大学历史系之请,独立讲授,于是糅合中西,分讲讲述,约得16讲,每年增订,写成的讲稿,近20万言。惟自觉其中有甚多窒碍难通之处,1974年至1975年间,再赴剑桥,乃矢志不写文章,悉力阅读,旧书肆中,流连忘返,图书馆里,消磨永昼,一年的时光,精神上的享受,到达极点,所作札记,多至难以驾驭。



凡以前所讲述者，深感多需充实修正，至此已彻悟“学问之无穷”了！

蓄意写一部《史学方法论》，始于讲授此课时。第一章写成的是1968年8月载于《史学汇刊》创刊号的《引书论》（1961年1月发表于《中央日报·学人》的《历史文章》，虽颇得好评，但自知缺陷很多。以后改写三次，入本书为第十四章《历史文章的特性及其撰写》，已非本来面目；《引书论》入本书为第十五章《引书的理论与方法》）。此后每年约写一章，不满意者即弃去，至1976年底，写成而收入本书者，为《比较方法》、《史学上的纯真精神》、《史学上的美与善》、《史学家的乐观、悲观与迷惑》诸章。1977年1月来港大，以甫莅新地，酬酢不多，遂倾全力撰写，历时两载，终底于成。全书凡二十二章，中西治史方法，粗备于此，而攻瑕指失，则有待于博雅君子。

本书的写成，凡教诲我的师长，启发我的朋友，以及发表诤言的诸生，都有很大的贡献。姚从吾师的启蒙、奖掖，尤其具有决定性。犹忆他于1965年11月20日为劝我申请哈佛燕京学社奖金，曾给我一封情词恳切的信：“我希望兄（按从吾师对弟子每以兄呼之）必须再度把握赴美的机会，到哈佛去住一年或两年，圆满的完成你贯通中西史学的理想。……兄应当把这两个剑桥连结起来，作一比较。这样在个人应当是一种享受；在事业上，增加了发言的力量，消弭了无谓的阻挠，自是有很多方便的。愚见：兄在哈大住一年或两年，与英美史学界名流交换意见，用英文写一部《中国历史学与历史书的发展》（即《中国史学史》），应当是很有用，很容易成功的。这是你的责任。敬请兄加以考虑，是所盼祷！天赋、兴趣俱佳，而又能中外史文兼优的朋友，越来越少了！兄应加倍努力，当仁不让！”接到此信后，我顿悟师道的伟大，十余年来，虽然我没有把两个剑桥连结起来，虽然我没有用任何语文写成一部《中国史学史》，而战兢自励，不敢一日稍懈；今殚力先写成此书，意在答恩师厚爱于万一。书中《史料析论》、《史料考证》、《历史辅助科学》诸章，多采师说，师说不可易，故存之以待世人。

内子孙雅明女士对本书的大功，是必须一提的。十余年来，容忍此一